

# 投 枪 集

吳 晗



# 投 枪 集

吳 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字数197,000 开本850×1168 版  $\frac{1}{32}$  印张10 插页4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平)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 前　　言

最近一个月，把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这六年間所写的一部分杂文，編在一起。編排是按時間順序的，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关于聞一多的文章，另一个是还乡散記，虽然時間順序不尽相同，也編在一起了，为的是性質相同；看起来方便一些，这叫做正中有奇吧。書名呢，实在想不出，叫杂文集；不大好，叫别的，想不出来，想了個把月，还是想不出合式的書名，真是文章好做，題目难出。但是，总得有个名目，重溫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罵国民党的。那时候，人民解放军用真枪真刀打敌人，我呢，躲在大后方，既无枪，又无刀，有了也不会使，只有一杆笔，真刀真枪比不上，比它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不能說放，但是，有枪总得使，怎么办？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要不痛，怎么会連李公朴聞一多这样的人也乱杀？无奈，姑名之曰“投枪集”。

这几十篇文章，都是发表过的，大部分是十年前从報紙雜志上剪下来，装了一口袋，保存到現在的。也有少数的几篇，当时沒有保存，最近才想法子补抄的。当然，这十几年中，所写的杂文不止这些，有些手头还保存着，看来看去沒什么意

思，只好仍旧装袋；也有一些文章，还记得内容，想想也还有点意思，但是，连发表的地方也记不起来了，找不到，托人打听，也打听不到，只好算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这是因为改不胜改，例如有些看法，十几年前确是那样，模糊、落后，许多问题不但看不清楚，也说不清楚。如今，看法改变了，算是有了些进步。但是，要动笔改，可难了，几个字，一两句还可以，要改全篇中心论点，可不成。因为要改就得全改，也就是重新写；与其重新写，以今天的眼光来代替十多年前的看法，冒充先知先觉，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再说，要是真有什么想写的，何如新写。何况，人总是从模糊到清楚，从落后到进步的，把过去这十多年有些模糊、落后的表现保留下来，我想，不但对自己是面镜子，就是对年青一代来说，也还是有些用处的。当然，意思不是叫人们欣赏我在某一时期的模糊、落后，而是说，不要怕模糊，怕落后，在党的教育下，只要肯努力，是一定可以取得进步的。

此外，在这些有些模糊落后的文字中，也还有点火气，有点辣气，反动派很不喜欢的味道在。也还有些历史事实，例如国民党的贪污，对日作战的“转进”，买办资本，通货膨胀，法币，物价，公教人员的生活，中苏关系，反苏运动，汉奸，特务，国民党士兵的生活，国民党发动内战，美国调处，暗杀，打风，政治协商会议，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破坏政协，伪国大，反内战运动，等等，当时写的时候，都是有的放矢的，到今天看来，也

还多少可以帮助人們回忆过去的情况。

当然，也該講清楚，这些文章都是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发表的，有些文章經過国民党检查官的刪改，甚至整段的刪去。更可恶的是有些地方的乱改，改得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馬嘴。因为沒有原稿可以核对，刪去的地方固然补不上，乱改的地方，除了照文义改回来一些以外，有些地方可能疏忽了，沒有能改回来。其次，在当时情况下，行文时只能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提，虽然語气有不同，中心論点有不同，但在提法上，只能这样說，不这样是发表不了的。也有个别地方，如浙道难，因为那时候国民党造謠說共产党破坏交通，这篇文章便通过浙贛路的破烂情况，說此地并无共产党，从侧面罵了国民党之类。第三，这些文章绝大部分用原名发表，也有若干篇是用笔名发表的，用的笔名有吳子直，高光，何无忌，刘勉，刘恢之，呂庆，公孙器之等等，現在都附注在原来发表的文章后面。

发表的刊物的名称，列举一下也很有意思，因为从这个单子中也可以看出这六年間的文化界的政治立場。就云南說，有云南日报，正义日报，扫蕩报，民主周刊，生活导报，評論报，自由論坛，工商青年，真报，觀察报，新报，周报，妇女旬刊，時代評論等等。應該說明的是除民主周刊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以外，云南日报，正义报和扫蕩报都是国民党官方的刊物，其中扫蕩报还是軍統的刊物，我怎么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呢？道理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政、党、軍的矛盾，云南地方当局和重庆政府的矛盾，利用他們內部間彼此的矛盾，偶尔也可以发表一些文字。第二，更重要的是这些国民党官方

刊物都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作秘密工作，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的。此外，从生活导报以下这些刊物，都是昆明各大学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凑钱办的，一无社址，二无固定印刷场所，三无稿费，四呢，出不了几期就被查封，封了再换名字又办一个，又封了又办。其中个别的甚至是油印的。

就重庆说，有新华日报，民主报，新生代等等；上海有文汇报，民主周刊，群众，文萃，周报，新文化月刊，中华论坛，中国建设；北平有民主周刊，清华周刊，燕京新闻，中建半月刊等等。到一九四七年，许多刊物都被查封了，我们只好出地下刊物，一期换一个名目，一共出过三本，记得一期叫社会贤达考，一期叫论南北朝，还有一期连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我们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钱，凑着出一期，谁知发到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书摊以后，尽管卖光了，但是钱却收不回来，我们也不敢要，只好另外想法再出一期，这样搞了一个时候，才偷天换日，出了上海中国建设的北平版，叫作中建半月刊，搞了一阵子，又被查封了，接着北平也解放了。

这几十篇文章，绝大部分都在篇末注有原来发表的时间和报纸、刊物名称期数，但是，也还有一小部分，因为辗转剪、抄，有的把时间漏掉了，有的连报纸、刊物的名称都找不到了，无法查对，只好空着了。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倒不这么看，自己的文章并不怎么好。那末，有人会问，既然不怎么好，为什么又要编集子出版呢？我说，我的道理是我的文章是说话，那

几年有話要說，所以寫文章。這些話在今天看來，很稀松很平淡。因為當年我們要爭取的，所追求的，不但全都實現，而且遠遠地大大地超過了。今天我們國家的伟大成就，在那時候，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當年我們所反對的，所抨擊的，都已經徹底摧毀，成為歷史陳述了。但是，我們當年確這樣想過，這樣說過，這樣罵過，這樣鬥爭過，這一段歷史，是值得回憶的，也還是值得年青的一代參考的。文章雖不一定好，文章的內容却還可以提供一些現代史的史料，不是嗎？

雜文到底該怎麼寫，怎樣寫才叫雜文，我也鬧不清。我所能弄清楚的是：第一，我的文章內容很雜，幾乎無所不談。第二，寫的時候沒有一定章程，想到就寫。第三，希望文章能使多數人看懂，把要說的話寫下來，有時候半文半白，文体也很雜。第四，大部分文章是有点意思就寫，寫完了才想安題目，弄得很苦。第五，發表了以後，人家說我寫的是雜文，於是我也認為是雜文了。但是，說老實話，到寫這篇東西的時候為止，到底雜文該怎樣寫，我還是不懂。是為前言。

(1959年7月6日清晨)

## 目 次

前言.....	1
論貪污.....	1
貪污史的一章.....	7
說士.....	15
生活与思想.....	20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訓.....	24
給士兵以“人”的待遇.....	28
報紙与輿論.....	31
新时代和新妇女.....	35
論晚明“流寇”.....	37
論“五四”.....	43
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	47
懲办汉奸·大赦政治犯.....	51
人身自由何在?.....	55
士兵們，放下枪杆来!.....	58
正告赫爾利將軍.....	60
抗議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	64

“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	67
文字与形式	69
“一二一”惨案与紀綱	72
論說謊政治	77
向政治协商會議控訴!	80
不提旧帳和不提联合政府	83
論扩大政府組織方案	86
对玩火者警告·向人民申訴	92
行动比文字更重要	94
論防止官僚資本之发展	98
图穷而匕首見	101
論历史觀点	104
从媽媽說起	108
两个赤字时代	111
救灾必須停战	114
警管区! 特务国!	119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	122
論反內戰运动	125
論打手政治	136
記第八大队	143
浙道難	155
真空的乡村	168
哭公朴	176
哭一多	181

聞一多先生傳	186
一多先生周年祭	191
論法統	194
論嗜殺政治	206
論中立	214
論文化殺戮	219
怎么办？	223
論新基礎	232
毛鴻上校	237
回紇助唐記	244
記張蔭麟	251
論經濟緊急措施方案	261
論紀念五四	264
社會賢達考	268
論奴才——石敬塘父子	273
論南北朝	279
知識份子今天的任務	292
論戊戌變法	294
悼朱佩弦先生	302
航海攻心戰術	307

## 論 貪 汚

古語說：“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历代相传的名言，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征之于过去的史实，这句话还可引伸为：“內政修明而有敌国外患者国必不亡！”“內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內政不修的涵义极广，举实例說明之，如政出多門，机构庞冗，横征暴斂，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貨币紊乱，盜賊橫行，水旱为灾等等都是，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現象是貪污。这現象是“一以貫之”，上述种种实例都和她有母子关系；也可以说貪污是因，这些实例是果。有了这些現象才会有敌国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则虽有敌国外患也不足为患。

貪污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的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我們这时代，不應該再諱疾忌医了，更不應該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了。翻翻陈帳，看看历代复亡之原，再針對現状，求出对症的藥石，也許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

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我們只能拣最膾炙人口的大人物举几个例，开一笔帳，“豺狼当道，安問狐狸！”下僚小吏，姑且放开不談。

过去历史上皇帝是国家元首，皇帝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財政向来分开，但是有时候皇帝胡乱浪费，公私不分，以国产为私产，恣意挥霍，闹得民穷财尽，这种情形，史不绝书。最奇的是皇帝也有贪污的，用不正当的方法收受贿赂，例如汉灵帝和明神宗。汉灵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后，每叹桓帝不能兴大家业，曾无私錢，故卖官聚錢，以为私藏。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初开西邸卖官，定价三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公千万，郎五百万。富者先入錢，贫者到官然后倍輸。崔烈入錢五百万拜司徒，拜日天子临軒，百僚毕会。灵帝忽然懊悔，和左右說，这官卖得上当，那时只要稍为揩勒一下，他会出一千万的。大将如段熲、张温虽然有功，也还是用錢买，才能作三公。又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国貢獻，先輸內廷，名为导引費。又稅天下田亩十錢修宮室，內外官迁除都先到西園講價錢，大郡至二三千万，付了錢才能上任；关內侯值錢五百万。他把国庫的金錢繪帛取归內府，造万金堂貯之，藏不下的寄存在小黃門常侍家。黃巾起义，卒亡汉社。

无独有偶，一千四百年后的明神宗也是爱錢胜过爱民的皇帝。他要增殖私产，到处派太监榷稅采矿，大督小监，縱橫釋驅，吸髓飲血，以供进奉。有的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有的发掘历代陵寢。豪夺民产，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諫止的一概不理，稅监有所纠劾的却朝上夕报，立得重譴。結果，內庫虽然金銀山积，民間却被逼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所遣稅监高淮激变于辽东，梁永激变于陝西，陈奉激变于江夏，李奉激变于新会，孙隆激变于苏州，楊荣激变于云南，刘成激变

于常鎮，潘相激变于江西，閩得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遣使到菲律宾采金，引起誤会，侨民被杀的至二万五千人。国庫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和农民起义外內交逼，无可应付时，朝臣請发內庫存金，却靳靳不肯，再三催討，才勉强发出一点敷衍面子。他死后，不过二十多年，明朝就亡国了。

皇后貪污亡国的，著名的例子有五代唐庄宗的刘后。史書說刘后出身寒微，既貴，专务蓄財，薪蔬果茹，都販鬻充私房。到了作皇后时，四方貢獻，分作两份，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又广收貨賂，营私乱政，宮中宝貨山积。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勅并行，藩鎮奉之如一。鄆都变起后，仓储不足，軍士有流言，政府請发內庫金帛給軍，庄宗要答应，她却說自有天命，不必理会。大臣再三申論，她拿出妝具和三个銀盆，又叫三个皇子出去，說：人家說宮中蓄积多，不知都已賞賜完了，止留下这些，請連皇子卖了給軍士吧。到庄宗被弑后，她却打叠珍宝駕在馬鞍上，首先逃命。余下帶不走的都被亂軍所得。

大臣貪污乱国的更是指不胜屈，著例如唐代的楊國忠、元載，宋代的秦檜、賈似道，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史書記元載抄家时，单胡椒一項就有八百斛，鍾乳五百两。严嵩的家产可支全国軍餉数年，抄家时有黃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不可胜数，隱沒未抄的不可數計。和珅的家产可以供給全国經費二十年，只要半数就够付清庚子賠款了。

太监得皇帝信任的，财产的数目也多得惊人。例如明代的王振。抄家时有金銀六十余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刘瑾擅权不过六七年，抄家时有大玉带八十束，黃金

二百五十万两，銀五千万余两，其他珍宝无算。

一般官僚的貪污情形，以元朝末年作例。当时上下交征，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无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賚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遇事要錢，成为风气，种下了亡國的祸根。

武人的貪污在历史上也不能例外，有个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时有一个大軍官被召入朝，百姓喜欢极了，說是从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这人在朝廷打点化了大錢，又回旧任，下馬后即刻征收“拔釘錢”。又有一个人大軍官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胡子，会心微笑，这人回任后，也向百姓要“摸胡子錢”。

上下几千年，細讀歷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簡直是黃鍾大呂之音，少得可怜。史家遇見这样稀觀的时代，往往一唱三叹，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已。

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計，想法子肃清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祿，他們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給俸祿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資，受过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如再违法受賊，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繩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綾、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隨廉人衣糧、廉人餐錢。此外又有茶酒厨

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面羊口之給。外官則別有公用錢，有職田。小官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都可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作事。一面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中外官犯贓的一定棄市。明代和宋代恰好相反，明太祖有懲于元代的復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污吏，重則處死，輕也充軍或罰作苦工，甚至立刻皮之刑，一時中外官吏无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正統以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後來便採用折色的办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米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余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原值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汚，更無別的法子可想。這情形政府當局未嘗不了解，却始終因循敷衍，不从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汚成為社會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從上述兩個例子看來，宋代厚祿，明初嚴刑，暫時都有相當效果，却都不能維持久遠。原因是這兩個辦法只能治標，對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發生作用。治本的唯一辦法，應該從整個歷史和社會組織去理解。

一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組織，我們的文化都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在農村里聚族而居，父子兄弟共同勞作，在社會上工商也世承其業，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從修

身齐家出发。孝友睦姻是公認的美德，几代同居的大家族更可以夸耀乡党。作官三辈子，不但誥封父母，荫及妻子，連亲戚乡党也鷄犬同升。平居父誥其子，兄誥其弟以作官发财，亲朋也以此相勉，社会也以此相欽美，“个人”在这环境下不复存在。一旦青云得路，父族妻族兒女姻戚和故旧乡里都一拥而来，祿薄固不能支給，即祿厚又何尝能够全部应付。更何况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来，在在需錢！如不貪污非餓死冻死不可！固然过去也有清官，清到兒女啼飢号寒，死后連棺材也买不起的，也有作官一辈子，告休后連住屋也沒有一間的。可是这类人并不多，一部正史的循吏传也不过寥寥几十人而已。而且打开天窗說亮話，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作清官，也只是用礼法勉强約束自己。有一个故事說某一清官对人說，錢多自然我也喜欢，只是名节可畏。正是一个好例。

根据这个理解，貪污的根絕，治本的办法應該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不工作者不得食，人与人之間无倚賴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組織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組織，从依賴家长生活消費性的社会組織，改变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产性的社会組織，自然上层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隨而改变。“人”能够独立存在以后，工作的收入足够生活，法律的制裁使他不願犯禁，厚祿严刑，交互为用，社会上有公开的輿論指导监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监察机关举劾糾弹，“衣食足而后知榮辱”，貪污的肃清当然可操左券。

(1943年 云南日报)